

# 谭家健

## 讲古代散文

谭家健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欧阳修的记叙文，语言精炼，工于描状，构思巧妙，有许多神来之笔。往往情文并茂，由景物引起反复咏叹，抒发感慨和议论。《醉翁亭记》是最能体现作者艺术成就的名篇。写作此文时，只有四十岁，由于贬官滁州，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故自号醉翁。在《题滁州醉翁亭》诗中，他自我解嘲说：“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所谓“遗万物”最主要的恐怕是政治上受打击而产生的苦闷罢。然而从这篇文章里，却看不出苦恼，倒是处处充满着乐趣。游人乐，宾客乐，太守与民同乐，连禽鸟也与人共乐。人与自然亲和，人与人亲和，一片和乐气象。这种意境，是欧阳修一向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的自然流露。在写作上的突出特点是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山水景物之中作为刻划的重点。这在一般游记中很少见，却能收到情景融汇的效果。写景时，以如诗似赋之笔，由点到面，由近及远，层次分明地介绍滁州山野的风光和亭的位置，并进而展示出山间朝暮四时的变化，以及滁人游山时有声有色的盛况，最后出人意外地以太守与民同乐和太守竟是作者自己的飘逸之笔作结。作者所勾勒的一幅幅画面，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随着空间的转换和时间的推移，象电影镜头似的映现在读者面前。文章运笔摇曳多姿，爱用长句，多用虚词，富于音乐感。特别是连用二十一个“也”字和以自问自答方式来写景叙事，正是他在继承前人经验（包括《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公羊传》的问答句，《孙子兵法》、《易传》的“也”字句等）的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据宋人笔记：“《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此文一出，滁州人特请苏轼用三种字体书写，刻碑立石于亭侧。结果“远近争传，疲于摹打（指拓其碑刻）。。。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舍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拓）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见《滁州志》）当时著名音乐家沈遵特地谱写了《醉翁吟三叠》。诗人黄庭坚将《醉翁亭记》改写成《瑞鹤仙》词。后来元人庾天锡又改编为小令《折桂令》。清人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说：“闻公初起稿时，从四方说来，有数句，共二十余字。后尽删，作此五字。（指首句‘环滁皆山也’）省而括，高而洁，于此可悟作文不贵冗长。又朝暮四时等，赋记中皆成套语，此只六句了之。亦见其人详我略，故不落俗套。”

CS

谭家健  
讲古代散文

谭家健 著

CTS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谭家健讲古代散文/谭家健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355-9445-7

I. ①谭… II. ①谭… III. ①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2758 号

---

书 名	谭家健讲古代散文
作 者	谭家健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a href="http://www.hnepi.com">http://www.hnepi.com</a> <a href="http://www.shoulai.cn">http://www.shoulai.cn</a>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2284117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60 16 开
印 张	14
字 数	177 000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5-9445-7
定 价	28.00 元

---





## 第一讲 《周易》、铜器铭文和《尚书》

我们今天所谓“中国散文”，指的是用汉字撰写的具有文学性的文章。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它最迟产生于殷商后期，而被发现则在19世纪末年。由于刻写在龟甲和牛骨上，用来记录占卜的提问和答案，故称甲骨卜辞。因为出土于殷代故都安阳，又称“殷墟书契”。今存甲骨卜辞每片长短不一，残缺不全，多数简短，十余字或二三十字。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北来雨？”

这是一段向天神问雨的卜辞，先叙后问，四个方向都问及，详备周到，句子整齐，文意明确。通常较为完整的卜辞格式包括：占卜的时间及主持者（叙辞），占卜的内容（命辞），占卜的结果（占辞），事后的验证（验辞），这样就形成了叙事的有序性。但是，甲骨卜辞的大部分字形难以辨认，不少片段文义不易揣测，还不是完整的文章，只能算散文的萌芽。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分为八卦：乾、坤、艮、震、巽、离、坎、兑。两卦相配，得六十四卦。解释每一卦的卦辞，往往仅数字而已。如乾卦的卦辞为“元亨利贞”四字。每卦分为

六爻，解说每爻者为爻辞，往往数句，多者二三十字。有的借用自然现象比附人事的顺逆，有的用传闻故事提示行为的吉凶，其含义具有模糊性和多解性。如《大壮》上六爻辞是：“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说明不可硬碰硬，否则进退两难。《无妄》六三爻辞是：“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说明不曾妄为却遭灾。有人拴牛，路人牵走了，同村人却被怀疑，遭了灾。这样的爻辞可以引申出很多启示。《易经》的卦形、卦辞、爻辞产生于殷末周初，原为占筮之用。后来经过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发挥阐释，约在战国后期，补充了十篇文章，称为十翼，或《易传》。包括《彖传》上下，解释六十四卦卦名、卦意和卦辞。《象传》上下，其中“大象”解释每卦卦义，“小象”解释爻辞。《文言传》是两篇优美的短文，分别解释乾坤两卦。《系辞传》上下总论《易经》的基本观念，属于通论性质，是《易传》最主要的部分。《说卦传》解释八卦所代表的方位和事物以及所体现的条理变化。《序卦传》解释六十四卦的次序和所表示的哲理。《杂卦传》解释各卦之间的关系及刚柔对立的意义。《周易》一书经过秦汉儒家和魏晋以后道家的利用之后，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格言谚语和象征手法，为后世文学家所继承和使用，滋养了古代诗歌和散文、辞赋。

**铜器铭文**，又称金文，是铭铸在钟鼎等器物上的文字。它们是从北宋以来陆续出土，陆续著录的。商代铜器铭文很少，最长不超过五十字。西周铭文文字逐渐增多，最长的《毛公鼎铭》四百九十八字。铸刻铭文之目的是颂功显荣，传留久远。其缘由或立功受奖，或晋升官职，或赢得诉讼，或射猎获胜，内容较卜辞丰富。

铜器铭文属于官方语言，风格庄重典正，文字艰涩深奥，句子古拙板滞，又多缺蚀，几乎与甲骨卜辞同样难懂。但是篇制完整，内容周到，叙述事件和人物言行，交代清楚。如《令鼎铭》，大意是说，王在淇田举行亲耕典礼，赏赐臣下。王射箭，官员及师氏、小子同射。王从

淇田归来，王的驭手谦仲驾车。令和奋两个人跑在马前面。王说：“令和奋，如果你们能够一直跑到宫中，我赏你奴隶十家。”王回到康宫，很高兴发布了赏赐命令。令跪拜叩头说：“小子不过是学习。”令颂扬王的恩德。此铭虽是写实性记录，却有过程，有行动，有对话，情节完整有致。

又如《颂壶铭》：记周王册命大臣的仪式、时间、地点、人物，所持器具，活动步骤等等，皆清晰有序。《散氏盘铭》三百五十七字，记矢氏侵占散氏领地，引起诉讼，经有关部门裁定矢氏应赔偿土地。铭文记载了诉讼缘由，交割土地的在场人员，测量，勘界，树标和最后约誓等全部情形。有的铭文主要记录周王或大臣训辞，如《大盂鼎铭》用正反对照方法，告诫孟不要纵酒。个别西周铭文有韵，整齐如诗，如《虢季子白盘铭》有大量四字句，隔句押韵，如：“王曰伯父，孔显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锡”是赏赐的意思。

铜器铭文的记言技术似乎成熟得早一些，不少人物语言生动活泼，富于气势和说服力。而记录动作或行动一般是平铺直叙，点到为止，很少修饰，动词重复率相当高，甚至有些程式化。从总体写作水平看，铭文旨在直录，实用性强，审美性不足。从体制上看，西周铭文已经不是散文萌芽，而是具体而微的散文雏形。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后世又称《书经》，儒家五经之一，是上古历史文献集。包括帝王谈话、训示、政府文告、誓词、命令以及法令草案、地理规划等等。以王公大臣为中心，以政治为内容，记言为主，记事为次。在《尚书》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例如用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和用汉代通行文字书写的今文《尚书》孰真孰伪问题。某些版本某些篇章的分合真伪问题，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讲。今传本《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共五十篇（其中有几篇分上中下，合计五十八篇），经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人的考辨，确认其

中二十八篇属于汉人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可以相信为先秦古籍。这二十八篇包括《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虞、夏之书是东周学者根据传闻写成，并非虞舜、夏禹时代之书。《商书》可以确认其中最早是作于殷商中期的《盘庚》篇。《周书》大部分作于西周，最晚的《秦誓》，作者是春秋初期的秦穆公。其他各篇作者，多数是史官，少数是王公大臣或学者。而这二十八篇之外者，被学术界称为“伪古文《尚书》”，是不可以当作先秦古籍来利用的。

这二十八篇《尚书》已是成熟的散文，不再是萌芽或雏形。不是片段，而是长篇大论。每篇字数，少则百余，多则上千，有头有尾，有中心，有层次，结构完整，大致奠定了后代议论散文的体制。采用了一些文学手段和修辞手法。如想象、夸张、形容、渲染、比喻、引证、铺陈、对比、押韵、炼句等等。具有相当的文字表现能力，注入一定的感情色彩。题目已显示文体的区别。全书标题有典、谟、训、诰、誓、命等，是后世某些公文的始基。典是典制，包括帝王政绩，如《尧典》《吕刑》；谟是谋议、谋略，如《皋陶谟》；训、诰是训诫诰令，如《盘庚》《大诰》《康诰》《召诰》《无逸》等，有上对下的训导，也有下对上的劝谏和君臣对谈；誓是誓词，如《汤誓》《甘誓》《牧誓》《费誓》，皆战前誓师词；命是册命，如《文侯之命》是周平王的赏赐文书。

《尚书》的常用词汇与春秋战国时期古文有所不同。如“诞”表示“大”，“攸”表示“所”，“克”表示“胜”，“乃”表示“你”，“罔”表示没有，“允”表示真正。还有些字词后世很少用，如“丕”“矧”“稽”“肆”“蒸”，汉人已觉得生僻，司马迁作《史记》引用时，不得不翻译。这些可能是当时口语或专门用语。至于后世常用虚词“之”“乎”“者”“也”很少用，关联词常被省略，语法顺序也和后来不大一样，所以读起来觉得别扭。其中《商书》尤为明显。

《尚书》是上古君王治国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其中的思想反映了从殷商到西周统治者政治观念的演变。殷人强调“敬天”“保命”，周人强

调“敬德”“保民”“慎罚”。重视以史为鉴，处处强调“夏鉴”“殷鉴”，告诫执政者要勤勉治国，不可贪图安逸。这些观念，影响了二三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后代史学意识的源头。

下面略举数篇为例。

《商书·盘庚》是记商王盘庚为了躲避水患，谋求国家发展，打算迁都，遭到臣民反对，一些官员甚至造谣惑众，诽谤盘庚，盘庚再三加以说服。文章运用一系列比喻，将迁都比为“若颠木之有由孽”，如同倒下的树木可以发出新芽，暗示迁都后部族可以新生。盘庚自称：“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衣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你们互相煽动谣言，“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好比在原野上燃起大火，火势不可接近，还是可以扑灭的。为了加强论证，还引用古贤人迟任之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维新。”这些语句，有的后来浓缩为成语。

《周书·金縢》篇是《尚书》中唯一的情节曲折的完整故事。文章说：武王克商不久，得了重病。周公向神灵祷告，愿代武王死。武王很快病愈，周公也没有死。史官把这件事和祷告辞记录藏在金属柜子里。过了若干年，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叔等挑拨说周公要篡位。成王怀疑，周公乃避居于奄。秋天，快要收获了，忽然天降雷电，大风把庄稼都刮倒了，大树被拔起。成王十分害怕，与大臣准备祷告上天，打开金属档案柜查阅有关文献。发现周公自求替武王去死的祷告文件，成王于是悔悟，便把周公迎接回来。这时，天乃下雨，风向也转了，倒伏的禾苗全都立起来，终于取得好收成。

这篇作品，文学性较强，已经有意制造悬念，富于传奇色彩，文字比较通畅。当初作于西周末或东周初，其结构与手法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和野史小说都有启发。（据报载，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有些篇与传世本《金縢》篇内容大致相同，但文句略有差异。）据《尚书》专家顾颉刚、刘起釞等研究，《金縢》的故事具有历史真实性。

古代帝王遇到天灾或疾病，认为是上天或鬼神施行刑罚，往往叫亲人大臣代他承担，替罪甚至替死。这种风俗，在《左传》中关于楚昭王得病的记载有所反映。顾、刘二氏还举出元代的《元秘史》为证，元太宗窝阔台得病，巫师认为是金国山川之神作祟，要亲人代之方能医治。于是太宗的弟弟拖雷，就替哥哥死了，太宗遂愈。故事与《金滕》颇相似。

《周书·无逸》篇，为周公告诫成王之辞，劝成王勤劳政事，无贪图安逸。文中引用殷中宗、高宗、祖甲、周太王、文王、武王等正面典范以及殷纣王等反面事例，列举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加以对照，劝诫成王不可“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指农民）之劳，惟耽乐之是从”。全文以史为鉴，引古喻今，层次分明，首尾连贯，感情强烈。

《尚书》有少数文章用韵。如《洪范》篇：“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好作，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句子整齐，声韵铿锵，反映了在实用基础上对语言艺术的审美追求。

从文字技巧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尚书》部分文章与甲骨卜辞、西周铭文大致同时，为何后者稚拙零碎，前者熟练完整？原因可能与记录工具和方式有关。在甲骨和钟鼎上铸刻文辞很不容易，不可能太长。《尚书》最初是用手写在简策上，战国后期再录于绢帛，所以容量较大。第二，《周书》中的《文侯之命》《秦誓》与《国语》《左传》时代相同，语言风格却明显不同。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由于前者是官方文书，用的是当时的“文言文”。而后者是民间著作，用的是当时的“通俗文”，或者是用“通俗文”改写原先的“文言文”。有如《史记》之改写《尚书》。

《尚书》一类文体，从春秋末年以后，就很少在社会上流行。但是，从汉至清历代皇室文告，凡庄重严肃的军国大事，需要祷告天地晓谕万民时，往往不用通常的散体文或骈体文，仍采用《尚书》体，以示郑重。

## 第二讲 《春秋》《左传》和《国语》

《春秋》“春秋”原来泛指上古各国史籍。由于孔子利用鲁国的史籍编写成一部历史著作，后世遂专指孔子之书为《春秋》。这本书的起讫年代（前 722 年至前 481 年）被后世概称为春秋时代。

《春秋》全书一万六千五百余字，它是第一部系统的历史大纲，以鲁史为线索，全面记录 242 年间中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礼仪等重大活动，逐年甚至逐月，没有间断，而且准确可信。较之资料汇编性质的《尚书》前进了一大步。

从文学史看，《春秋》还不能算散文，仅有句而不成篇。记事极简略，最短者一年仅一字，最长的一年四十余字，相当于今天报纸的要闻标题，但对后世散文有贡献。第一，创立了所谓“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曲折地给人物和事件以恰如其分的评价，通过“微言大义”，“寓褒贬，别善恶”。第二，有意规避，为尊者讳。例如鲁桓公在齐国被齐襄公派刺客杀害。原因涉及宫闱丑事，不便明说，《春秋》只用“公薨于齐”四字轻轻盖过。第三，言简意赅，用词造句精确有序。如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鹗退飞，过宋都”。“陨石”句，先听觉，后视觉，找到落地之处，再计其数。“六鹗”句，粗看天上有六点黑点；细看原来是鹗鸟；仔细瞧，竟然是退飞；继续盯着看，它们到底飞向何方，经过宋都才不见了。如此细密地观察和描述，不仅功在后世记事文学，在自然科学考察史上也树立了榜样。

《左传》《春秋》成书之后，不少人为之作注释，当时称为“传”。今存有左氏、公羊氏、谷梁氏三传。最重要的是《春秋左氏传》，简称

《左传》。通常认为作者是左丘明，鲁国人，较孔子年代稍晚，故记事虽与《春秋》同时开始，而结束晚于《春秋》十三年。此书以《春秋》为纲，逐年补充，详记孔子所略史实。全书约二十万字。篇幅比《春秋》扩大十几倍，是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史和成功的历史散文。

左丘明十分尊重孔子，以孔子之是非标准来评价历史，但也有差异。第一，孔子尊王贬霸，左氏对周天子十分冷淡，写五霸虎虎有生气。第二，孔子尊君贱民，左氏表现出明显的民本思想。第三，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左氏相信鬼神、卜筮，记录了不少迷信活动；又主张民为神之主，似乎天和神也要服从民意。

《左传》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擅长写战争。**《左传》记述数百次战争，重点写五大战役（城濮、崤、邲、鞍、鄢陵），轰轰烈烈。写小的战斗也各具特色。作者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描述，总是力图深入揭示战争的酝酿经过，诸多矛盾的形成与激化，或胜或负的经验与教训，使读者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如晋楚城濮之战，是两大国争霸的第一次较量。从晋文公整顿内政写起，如何训练士卒，慎择将帅，严肃纪律，确立忠信观念等等。楚方也在准备，却优劣不同。接着写扫清外围：攻曹，围卫，救宋，报德，伐怨。既而展开争取齐、秦的外交活动。楚方请晋复曹卫，楚亦解宋之围，在道义上争取主动。晋国君臣巧妙破解这一箭三雕之计，化被动为主动。待到两军对阵，晋文公又按往日的承诺，退兵三舍；采纳善言，克服攻击前的犹豫，进行正确的部署。楚军主将子玉骄而无礼，求胜心切，君臣意见分歧。预示双方道义上的优劣。待到写战斗过程，却极简略。晋将胥臣选择楚方薄弱的右翼——附属国陈蔡之师为突破口，很快得手。栾枝用伪遁迷惑楚军左翼，把敌人从坚固的阵地上调出来，在战斗中以中军主力横击，以上军夹攻，楚左师被击溃。作者笔头时而晋，时而楚，时而左，时而右，时而进，时而退，写得雷轰电掣，海涌山飞，使千军万马，跃然纸上。结果，晋军得胜，楚军大败。下面又写子

玉自杀，晋文公得知后方才放下心来。文章最后总结说：“君子谓是役也，能以德攻。”即所谓“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这也是左氏对待当时许多战争的基本态度。

小的战斗如齐鲁长勺之战。作者首先注意靠什么打仗的问题，靠祭祀神灵和小恩小惠都不行，只有诚心实意为百姓办事，才能有战胜强敌的群众基础。然而仅仅道义还不够，必须讲究战略战术。在战斗中要避免敌人之锐气，击其衰竭，要仔细考察地形，正确判断敌军虚实，选择适当时机发动进攻和追击。《左传》十分欣赏其中关键人物曹刿，对他的言语、动作、神情、心态、指挥若定的气派，有非常具体的刻画。两“未可”、两“可矣”，故意不详说，一方面反映戎马倥偬，时间来不及；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有意卖关子，制造悬念。这个故事《国语》和《管子》都有记载。二书详于记言，略于记事写人，其文学性比《左传》差。

**第二，精心描述政变。**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得手的政变。如，齐人杀庆舍。齐简公时，庆封专政，荒淫残暴，到处树敌。其子庆舍实际主事，狂妄自大，竟任用反对派的人为警卫。反对派鲍氏、陈氏等暗中串联，准备围攻庆氏。族人庆嗣把种种迹象报告庆封，他十分骄傲，不做防备。反对派早把两名刺客埋伏在庆舍身边。又利用街头表演惊吓庆氏卫队的马匹，并瓦解其武装，夺取其兵器。外面解决了，用暗号敲窗户三下，通知里面动手。一名刺客从后面刺其背，另一刺客从左面砍其肩。庆舍虽负重伤，仍然摇动庙椽，把屋上的瓦都晃动了，还拿起祭器杀伤敌人，才气尽而死。情节戏剧化，镜头多变换，比得上后世的电视剧。二类是失败的政变。如晋灵公谋赵盾。灵公暴虐，久失君德，把执政大臣赵盾视为眼中钉，派刺客入室行刺，刺客竟愧而自杀，不从君命；灵公设酒席埋伏，却有甲士临阵倒戈；人无可使，至于用犬，足见其失道寡助。赵盾恭敬爱民，忠于国家，故能得道多助，遇难呈祥，化险为夷。御者提弥明临危授命，以身殉职，正是赵盾平时宽厚待下的结

果。在刀光剑影的厮杀关头，却从容补叙首山救饿往事。“初”字放开，“既而”收拢，张弛得体，伸缩自如，似乎节外生枝，实为妙笔生花，真不愧叙事高手。后世戏剧有《闹朝扑犬》等，即演义其事。三类是第三者得利的政变。如楚国子干子皙发动政变，楚灵王自杀，公子弃疾故意制造混乱，弄得子干子皙惶惶不安而自杀，弃疾坐收渔利，取得政权。又如楚白公胜之乱，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地位尚未巩固，被叶公子高反攻过来，白公胜也以自杀告终。这些政变，头绪纷繁，矛盾错综，人物众多，情节曲折。作者能抓住要害，剖析其因果关系，以大人物为中心，以小人物为陪衬，写来有条不紊，重点突出，疏密得当，为后世史传文学和历史小说提供了经验。

**第三，刻画人物个性特征。**《左传》还没有后世那种人物专传，而是通过分散在不同时间的言语行为，从而展示其品德和性格。大致可分为累积型和闪现型两大类。前者主要是重要国君和著名卿大夫。如郑庄公，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可见其不“友”又不“孝”。隐公三年，周郑交质又交恶，可见其对周天子不“忠”。隐公八年，郑伯朝王，改善了周郑关系。隐公十一年，郑伯联合齐鲁伐许，可见其外交手腕和善于辞令。伐许之后的“诅颖”，可见其“军纪”之欺骗性。桓公五年，周郑矛盾激化，战于长葛，周军失败，被射中王肩，可见其“跋扈”；郑伯竟半夜劳王，以示不为已甚，为自己留下后路。通过郑人侵卫、北戎侵郑以及周郑之间、周许之间等多次战斗，又可以看出庄公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就这样，通过廿余年十几次大大小小的事件，或详或略的描写，作者终于把这位春秋初年堪称小霸的枭雄形象刻画出来了。所谓闪现型，即通过一时一事或一言一行，显现其不凡的见识和卓越的人品，虽在历史上一纵即逝，但由于有《左传》的生动记录，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郑国爱国商人弦高，在得知秦军秘密入侵郑国的迹象后，机智地冒充郑国使者以十二头牛犒琴师，设计稳住敌人，同时迅速向国内报告。终于争取宝贵时间，使敌人中途撤军。弦高只出现一次，

然而其爱国义举，在历史上放射着不灭的光辉。

**第四，《左传》的叙事“好奇”。**这主要是指作者每每通过神奇的故事甚至想象的手段，来增强情节生动性趣味性。如晋平公大厉，写了三个梦。第一梦，晋景公冤杀赵同、赵括，心怀鬼胎，梦见赵氏祖先来报仇。乃请巫者详梦，预料他吃不到新麦。请医生病治，又梦见病魔变成二童子，居于膏肓，医者无可奈何，后世成语“二竖为虐”“病入膏肓”即出于此。六月，新麦登场，景公眼看吃到新麦，认为巫者预言是胡说，杀之而后快。当麦饼到了嘴边，忽然肚子胀如厕，病发堕厕而死，竟验证巫者言之不诬。第三个梦者是小奴隶，梦负晋侯登天，以为是吉兆，结果却让他殉葬。三梦皆无稽之谈，然而其中不乏批判讽刺。景公之残暴，至死未改。情节设置巧妙，变化多端。前中后三梦，一一照应，丝丝入扣，颇似志怪小说。

**第五，关于《左传》的记言。**精彩的行人外交辞令。例如秦晋韩之战，晋惠公被俘，晋大夫阴飴甥赴秦和谈，要求释放惠公。以战败国对战胜国，却不卑躬屈膝苦苦乞求，而是有礼有节据理力争。秦伯想摸清晋国虚实，问“晋国和乎”。阴飴甥目的本是求和，却故意回答“不和”。然后从小人君子两种意见分说，分析和与不和的两种准备，共同点则是以武力求和平。秦伯又问你们怎样看待被俘的惠公，因为这是秦国手中的一张王牌。阴飴甥仍从小人君子分说，无非是放归与扣留两种可能。进而以君子立场剖析放归对秦国如何有利，扣留如何不利。句句是替秦国着想，又句句以晋人口吻说出，确实是如簧之舌，把捧场的话和指责的话都讲得特别动听。僖公三十年，郑烛之武退秦师，着重剖析秦晋郑三国利害关系，强调亡郑无利于秦，反能有利于秦之宿敌晋国，保存郑国对秦国有益而无害。说理周密，委婉动听，因而打动秦穆公立即退兵。此外如楚屈完对齐桓公，齐宾媚人对晋郤克，都是在紧张的战陈之际，弱者依靠辞令对付强者，据理抗争，终于缓解矛盾，保存国家尊严和外交体面。皆精心结撰之名作。恳切的臣下谏说之言。如僖公五

年，虞宫之奇谏虞公假道于晋以伐虢，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关系，后来成为成语。桓公六年，随季梁谏追楚师，告诫小国之君切勿轻敌，要相信民众，不要迷信神灵。都是历来传诵的名文。

《国语》是西周初至春秋末各国文献汇编。旧题左丘明撰，历代大有怀疑。今人多认为，《左传》和《国语》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原始作者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各国史官，编辑成书也许略早于《左传》，后来又有所补充。

《国语》不是编年体，而是分国体，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所记言行都是片段的，独立的，之间无连贯。今本《国语》二十一卷，分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君臣言行。《国语》与《左传》记事有不少重复，稍加比较，不难看出《左传》在《国语》基础上提炼加工的痕迹。有些事件大致相同，人物，地点，时间互有差异。《国语》虽有儒家观念，同时采纳法家、墨家、纵横家，这种兼容并包现象与《左传》多依照孔子思想及礼仪观念来评价历史人物，显然有别。

《国语》的文学价值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国语》记人，已有将某个人物言行相对集中，为人物专传提供素材的意图。如《鲁语下》一至七章皆叔孙穆子言行，《晋语三》共八章专记惠公活动，《晋语四》共二十四章专记文公，《晋语七》共九章专记悼公，《晋语九》第五至十一章皆与赵简子有关。这些片段自成起讫，没有融合成有机整体。只能算一组，不能算一篇。在编者心目中，记言仍是重点，因事见人只是不自觉的尝试而已。《越语》例外，其上篇实际是勾践的专传，下篇可以看成范蠡专传，两篇首尾完整，不过记言多于记行。《国语》已能在矛盾中揭示人物心态及其发展，运用对比体现作者爱憎。如晋文公重耳与惠公夷吾，骊姬与太子申生，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等皆是。作者很少直接褒贬；从其客观叙述或转引第三者评论中，可以看出是非观和倾向性。全书多以国君为主角，还有一些片段记公卿大夫的嘉言善政，远见卓识，奇行异举。虽然一鳞片爪，也